

---

---

#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的影响因素 及其应对策略分析

张季风 房汉国

**内容提要:** 对日本遭受美国频繁反倾销调查的背景和日本的应对策略进行历史回顾,利用泊松和负二项模型对影响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的宏观经济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的回归结果符合经济学的预期,为制定反倾销政策提供了方向和支持。日本的应对策略可以归结为贸易平衡战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巧妙利用日元升值、提高创新能力和预警战略等。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中日两国在遭受美国反倾销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应对美国反倾销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反倾销 泊松模型 负二项模型 日美贸易摩擦

**作者简介:** 张季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房汉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F7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874 (2014) 03-0089-17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日本频繁遭受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一度成为美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国家。90年代以来,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对外实施反倾销调查的头号对象。中国遭遇美国反倾销的状况与日本惊人地相似,而且由于意识形态、打压潜在战略对手等非经济因素的存在,美国对中国出手更狠,实施反倾销的频率更高。昔日的日本通过一系列措施,如出口地区多元化、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逐步减少同美国的贸易摩擦,有效地规避了美国的反倾销调查。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虽然研究日美贸易摩擦的成果很多,但研究日本应对美国反倾销的成果特别是专门针对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进行定量、定性综合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试图对影响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的宏观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其应对策略以及中日两国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异同点,以资对中国应对美国反倾销调查有所借鉴。

## 一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历史回顾

何谓“倾销”？何谓“反倾销”？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一国的出口商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如果因此对成员国领土内已经建立的某个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威胁，或者对某国产业的新建形成实质性阻碍，则构成“倾销”。成员国为了抵制这种倾销对本国产业的损害或者威胁，对来自该企业或者该国的产品征收一定额度但不超过倾销差额的进口附加税来达到抵消倾销压力的目的，这便是“反倾销”。

反倾销制度原本应是自由贸易规则下对加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合法权益的一种保护措施，当然也是对加害国的一种惩罚措施。然而，事与愿违，长期以来反倾销常常被滥用，已成为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框架下自由公平贸易体系的主要障碍。更确切地说，反倾销是一种被巧妙设计的保护主义形式。美国对日本和中国频繁展开的反倾销调查，就具有非常鲜明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反倾销是美国寻求贸易保护的一种高明手段，偏离了利用反倾销寻求公平贸易的初衷。<sup>①</sup>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但是，由于当时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所以虽面临来自日本经济的巨大竞争压力，美国也较少采用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产业。即便对日本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也十分有限。

1973~1975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经济严重衰退，贸易逆差快速增长。这使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开始增设各种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的产业。反倾销手段由于本身的便捷性、针对性和高效性等特点，成为进口国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 1979 年关贸总协定第七轮（东京回合）谈判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水平下降到 6.3%。<sup>②</sup> 在此背景下，各工业化国家纷纷使用反倾销手段来填补利用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和本国市场的空缺，致使 1979 年后世界各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目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而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逐渐提高，在

<sup>①</sup> Feinberg R. M., "U. S. Antidumping Enforcement and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Revisited: Do Petitioners Learn?",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Vol. 141 (4), 2005, pp. 612-22.

<sup>②</sup> 参见王林生、张汉林：《反倾销热点剖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 页。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对美国进行了“疾风骤雨”式的出口。日本的机电产品、半导体和信息产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市场形成重大冲击，日美贸易摩擦由个别产业发展为全方位的综合冲突。<sup>①</sup>

由图 1 可以看出，日本对美出口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 1977 年的 12.21% 上升到 1986 年的 22.23%，几乎增长了一倍，80 年代后期也维持着 20% 的高水平。特别是在美欧陷入经济“滞胀”时期，日本率先走出经济衰退，实现了稳定增长。因此，在 70 年代末期和整个 80 年代，日本对美出口持续扩大，变成了美国的最大经济威胁，自然也就成为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头号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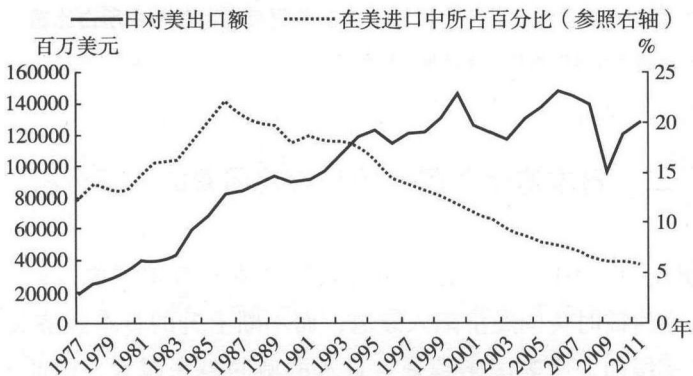


图 1 日本对美出口额及其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1977 ~ 1984 年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1985 ~ 2011 年的数据来源于美国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由图 2 可以看出，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实施反倾销数目和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数目在美国实施反倾销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各个年份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在美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总数中所占比重均在 10% 以上，最高达到 40%。此后，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措施，因此 90 年代这两个指标逐渐下降并且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进入 21 世纪，由于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对美国经济的竞争威胁相对变弱，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开始将矛头转向中国，而对日反倾销调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sup>①</sup> 参见戴龙：《日本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经验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当代亚太》2011 年第 4 期，第 78 页。



图2 美国对日反倾销数目及其在美国反倾销总数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公布的数据制作。

## 二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缘何频繁遭受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彼时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而不断上升的日本经济又咄咄逼人，对美出口迅速增加，使美国感到来自日本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不得不利用反倾销手段进行反击。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诱发因素可以从四个角度考察：美国的经济状况、日本的经济状况、日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因素。虽然反倾销手段的频繁运用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但是从1979年开始全球反倾销数据库才有了对反倾销调查较为完整的统计，因而本文采用1979~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用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立案数目（记作AD）作为因变量<sup>①</sup>。因为这是典型的离散变量作为因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采用泊松模型或者负二项模型。

### （一）变量选取和模型预期

本文选取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记为EGR）<sup>②</sup>和美国的失业率（记为UNEM）<sup>③</sup>为美国的经济状况的标记；选取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美国经济

①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立案数目序列为笔者根据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公布数据整理得出。

② “美国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World Bank Data）。

③ “美国失业率”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中的影响力（记为 FDIR）<sup>①</sup>、日本对美国的市場渗透率（记为 IMR）<sup>②</sup> 来代表日本的经济因素；选取日本对美国貿易順差額的变动数据（记为 DBOP）<sup>③</sup>、日美之间的实际汇率变动率（记为 RERGR）<sup>④</sup> 表示日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所选取的两国间政治因素是反映美国选举是否会对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造成显著影响的哑变量（用 Dummy 表示）<sup>⑤</sup>。

据此建立的模型为：

$$\ln(E[AD_t = y_t | X_t]) = \beta_0 + \beta_1 EGR_{t-i} + \beta_2 UNEM_{t-i} + \beta_3 IMR_{t-i} + \beta_4 FDIR_{t-i} + \beta_5 DBOP_{t-i} + \beta_6 RERGR_{t-i} + \beta_7 Dummy_{t-i} + \varepsilon_t$$

模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回归结果预期如下：

命题 1：当美国经济状况较好时，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相对较少；反之，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相对增加。

当美国的经济状况较好时，国内对商品的需求较为旺盛，经济繁荣，同时企业的年度利润也较大，企业雇用员工人数趋于增加，失业率降低。因此来自民众的压力较小，国内相关企业的反倾销申诉减少，政府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动力不大。反之，相关利益集团会游说国会保护相关产业的发展。

命题 2：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数目与日本对美市場渗透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日本对美国的市場渗透率是指日本对美出口額在美国进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日本对美国的市場渗透率越高，意味着日本对美国市場的依赖程度越大，美国对日本出口的制约能力越强，实施反倾销制裁的能力也越强，因此日本越有可能遭受美国的反倾销调查。反之，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降低。

命题 3：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与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美国经济中的影响力存在负相关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规避貿易摩擦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日本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可以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美国，生产的产品直接在美国市場上与

① “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数据中，1979 年的数据来源于《Statistical Abstract of United States》，1980～2011 年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研究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

② “日美之间貨物進出口額和美国的進出口額”数据中，1979～1984 年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1985～2011 年的数据来源于美国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③ “日美之间的進出口額”数据中，1979～1984 年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贸易统计年鉴》，1985～2011 年的数据来源于美国普查局，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得出“日本对美国的貿易順差額”数据。

④ “日美之间实际汇率”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⑤ 即对选举年份赋值为 1，非选举年份赋值为 0 而建立的哑变量。

美国资本控制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竞争,规避了反倾销诉讼。同时,日本可以通过“逆进口”将在美国生产的产品由在美国的子公司出口到日本市场,加大了美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减少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降低了美国对日本发起反倾销调查的积极性。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日本80%的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美国,这一比重直到90年代后期才逐渐降低。本文采用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衡量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在美国经济中的影响力。

命题4:日元兑美元汇率贬值会增加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反之,日元升值会减少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

实际汇率的变化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动,从而影响到两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一般来说,日元贬值会增强日本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对美国出口增加,自然容易引起美国对日反倾销调查。但从微观上讲,汇率的变动对反倾销调查数目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从倾销价格来说,日元升值时,假设商品的美元价格不变,则以日元衡量的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会降低。这使得国外机构在裁定日本是否存在反倾销行为时会得出不利于日本的结论。(2)从倾销损害判定的角度看,当日元升值时,以美元衡量的从日本进口商品的价格会相对上升,进而减弱该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使得进口商品的数量减少,市场占有率降低,这就使得该商品的进口不满足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条件,从而降低了美国企业对日本商品发起反倾销申诉的可能性。日元升值后,日本“出口产品以美元表示的价格到底如何变化在根本上取决于美元汇率传递效应的完全程度”<sup>①</sup>。

命题5: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增加时,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会增加;反之,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会减少。

贸易顺差是影响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表明:在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处于有利的地位,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处于不利地位。当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时,美国企业会通过反倾销起诉来保护本国的产品和市场;并且,在面对贸易逆差时,美国相关机构更加倾向于通过反倾销起诉解决问题。因此,日本对美贸易顺差额的增加,会引起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增加。本文将日本对美

<sup>①</sup> 苏振东、严敏:《美国对华反倾销反补贴并用影响因素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第40页。

国的贸易顺差额进行了一阶差分,用以表明贸易顺差额的变化。

命题6:美国在大选年时对日本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目会增加。

在换届选举时,美国的政治利益集团为了获取美国民众的选票,往往会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降低本国的失业率为借口实施贸易保护。而与美国贸易摩擦严重的国家往往会成为其政治利益的牺牲品。

## (二)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用 EViews6.0 进行回归,综合考虑经济的“时滞”影响、回归系数的符号是否符合经济意义、变量是否显著,并根据赤池准则、施瓦茨准则数值极小化原则和似然比(LR statistic)的极大化原则来选定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

根据泊松和负二项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回归各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的符号一致,验证了笔者关于影响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因素的理论分析;回归结果中各个变量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采用稳健性方差的回归模型各

表1 泊松和负二项模型回归结果

因变量: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期望值					
自变量	预期符号	系数1 (Z值)	系数2 (Z值)	系数3 (Z值)	系数4 (Z值)
EGR (-1)	-	-0.1114 * (-1.8121)	-0.1114 *** (-3.1618)	-0.1114 * (-1.8121)	-0.1114 *** (-3.1618)
UNEM (-1)	+	0.2006 * (1.8085)	0.2006 ** (2.4871)	0.2006 * (1.8085)	0.2006 ** (2.4871)
IMR (-1)	+	0.1633 *** (4.5689)	0.1633 *** (8.0838)	0.1633 *** (4.5689)	0.1633 *** (8.0838)
FDIR (-1)	-	-0.5165 * (-1.8900)	-0.5165 *** (-4.2314)	-0.5165 * (-1.8900)	-0.5165 *** (-4.2314)
DBOP (-1)	+	4.93E-05 ** (2.4524)	4.93E-05 *** (3.7217)	4.93E-05 ** (2.4524)	4.93E-05 *** (3.7217)
RERGR (-1)	+	0.0293 ** (2.4567)	0.0293 *** (4.2512)	0.0293 ** (2.4567)	0.0293 *** (4.2512)
Dummy	+	0.5160 ** (2.0440)	0.5160 *** (4.1588)	0.5160 ** (2.0440)	0.5160 *** (4.1588)
常数项		0.5867 (0.5039)	0.5867 (0.8577)	0.5867 (0.5039)	0.5867 (0.8577)
R <sub>2</sub>		0.8267	0.8267	0.8267	0.8267

注:(1) \*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2)“系数1”这列代表采用泊松模型的回归结果;(3)“系数2”这列代表采用稳健性方差的泊松模型回归结果;(4)“系数3”这列代表负二项模型的回归结果;(5)“系数4”这列代表采用稳健性方差的负二项模型回归结果;(6)通过四舍五入,回归系数和Z统计值仅保留了小数点后四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计量回归结果整理得出。

变量大都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这些因素是影响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要素; 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近似于 0.83, 表明拟合较好; 采用泊松模型和负二项模型的回归系数的符号相同, 在四位小数点内系数大小一致, 说明模型的稳健性较好。

在泊松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中,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期望值作为因变量是通过对数的形式给出的, 因此模型实质上是一个线性对数模型, 其系数解释是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引起因变量的变化, 以百分比计。笔者对采用稳健性方差回归的负二项模型的计量结果进行分析 (具体数据参见表 1 的最后一列) 后, 得出如下结论:

1. 美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与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呈现出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符合经济预期。美国经济增长率的系数是  $-0.1114$ , 这表明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会使得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增加  $0.1114\%$ ; 美国失业率的系数是  $0.2006$ , 这表明美国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得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增加  $0.2006\%$ 。

2.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 日本对美国市场的渗透率与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数目在统计上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回归系数是  $0.1633$ , 表明日本对美国市场的渗透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得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增加  $0.1633\%$ 。由此可见, 美国对本国市场和本国产业的保护十分注重。

3. 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美国经济中的影响力与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有统计上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这符合理论预期。其回归系数是  $-0.5165$ , 表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在美国 GDP 中所占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会使得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减少  $0.5165\%$ 。这表明, 通过直接投资将产品生产转移到国外是一种规避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

4. 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变动与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呈现出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回归系数是  $0.000049$ , 这符合经济理论, 表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变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会使得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增加  $0.000049\%$ 。

5. 日美之间实际汇率的变动与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呈现出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回归系数是  $0.0293$ , 即日元兑美元汇率贬值幅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会使得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增加  $0.0293\%$ 。反之说明, 日元的合理升值会减少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



数目,因为日元的升值会降低日本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

6. 在1%的显著性水平之下,美国大选对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呈现出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回归系数为正,表明与非大选年度相比,在美国的大选年度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数目会增加。这说明反倾销已经偏离维护贸易公平的初衷,成为实施贸易保护和美国政治利益集团获取利益的工具。

### 三 日本应对美国反倾销的策略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经济衰退、日本对美出口剧增和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扩大等等。日本在长时间应对美国反倾销调查的过程中,正是针对上述原因“对症下药”,在刻意减少对美出口和缩小对美贸易顺差方面做足了文章,逐渐形成一整套由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构成的“三位一体”网络,有效地应对了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总体来看,日本的应对策略可归结为贸易平衡战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巧妙利用日元升值、提高创新能力和预警战略五个方面。

#### (一) 实施贸易平衡战略应对反倾销摩擦

##### 1. 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日本政府从日本的整体利益出发,制定多元化对外经贸战略。战后以来,美国一直是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这也是日本频繁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结构性原因所在。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主动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接下来又逐渐强化了与“亚洲四小龙”的贸易联系。至于中日贸易,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日本就通过官民并举的方式不断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重更是迅速上升,2007年以后中国已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相对,70年代以后日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重逐渐下降,特别是日本对美出口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幅度更大,由1970年的30.7%下降到1980年的24.2%,虽然在90年代曾反弹到30%,但进入21世纪后又转入下降趋势,2010年下降至15.5%。<sup>①</sup>可以说,日本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变。

<sup>①</sup> 公益財団法人矢野恒太記念会編集『数字で見る日本の100年 日本国勢図会 長期統計版』(改訂第6版)、2013年。

日本的主要做法包括：首先，政府通过行政指导、事前审查等方式对日本出口企业进行劝告和指示，使日本企业服从政府的多元化经贸战略；其次，行业协会遵循政府的经贸战略，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出口进行协调，进而对出口的目标市场和出口产品的价格进行指导，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和数量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不仅避免了日本国内对同一市场大量出口而引起的贸易摩擦，也避免了因出口恶性竞争导致出口价格下降而引起的反倾销摩擦，而且还降低了日本对某一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 2. 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和推行进口自由化，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

正如上述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与美国对日反倾销调查数目成正相关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日本保持长期贸易顺差，而且顺差主要来自于对美贸易，80 年代对美贸易顺差约占日本贸易顺差的 70% 以上，其中有些年份，例如 1980 年、1981 年对美贸易顺差甚至达到日本外贸顺差总额的 1.5 倍和 1.7 倍。<sup>①</sup>毫无疑问，日本对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因此，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就成为平复美国不满的当务之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减少对美出口，增加自美进口。

在减少对美出口方面，日本的主要做法是实行自愿出口限制，降低对美国的市場渗透率。所谓“自愿出口限制”，指的是为了防止进口国实行其他形式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政策，出口国对本国出口产品实行的出口约束。自愿出口限制同配额的作用相似，均是限制本国商品的出口。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自愿出口限制的执行方是出口国，而配额的执行方是进口国。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日本为了缓解同进口国日趋严重的贸易摩擦，同美国、欧盟等出口对象进行协商，对本国出口产品进行自愿出口限制。日本同美国达成的自愿出口限制协议主要有“对美纺织品出口自愿限制”、“对美钢铁产品出口自愿限制”、“对美彩电出口自愿限制”、“对美汽车出口自愿限制”和“对美半导体出口自愿限制”等等。为了缓解同国外的贸易摩擦，自愿出口限制是日本最常用的手段，因此日本也成为世界上实行自愿出口限制数量最多的国家。据统计，日美贸易的 40% 被纳入了日本自愿出口限制的范围。<sup>②</sup>

在增加自美进口方面，日本的主要做法是推行进口自由化政策，具体来说，就是降低关税壁垒和取消一些非关税壁垒，逐渐开放日本国内市场。在

① 財務省「貿易統計」各年版。

② 参见王厚双、邓晓馨：《日本“三位一体联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经验与启示研究》，《东北亚论坛》2008 年第 2 期。

关税方面，日本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其关税税率在发达国家中就已处于最低水平。如 1980 年，日本的关税税率为 2.5%，低于美国 3.1% 的关税税率；1985 年，日本的关税税率为 2.6%，低于美国 3.3% 的关税税率。8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又多次降低或取消部分产品的进口税。例如，1986 年分别两次对 1853 种进口商品降低了 20% 的关税，1987 年取消了 33 种低税进口商品的进口关税，1990 年又降低了 1004 种进口商品的进口税。在非关税壁垒方面，日本逐渐加大了对农产品的进口，如在 1980 年逐渐取消了对柑橘和高级牛肉等产品的进口配额。此外，日本在简化进口检验程序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如日本在 1983 年对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实行“内外企业无差别”的原则。

### （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摩擦

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规避反倾销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在上述实证分析中已经得到证明，而且在经典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实。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日本企业可直接在国外市场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使得原先在日本本国市场生产并出口的产品被直接在美国投资生产的同类产品替代，这减少了日本对美国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日本将产品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之后，日本本国企业甚至会从美国进口该种产品，使得日本的进口数量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进出口的此消彼长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缓解日美之间的反倾销摩擦。

日本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出现在 1972 ~ 1974 年，主要是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一部分纺织产品的生产能力，然后再将产品出口到美国，通过这种迂回出口战略减少日本遭受美国的反倾销调查。第二次直接投资高潮出现在 1978 ~ 1981 年，其中对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家电和汽车行业，主要目的就是为减少美国对日本彩电、汽车等行业的反倾销调查。第三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出现在 1985 ~ 1989 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半导体、汽车等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强，美国对这些行业发起反倾销调查，迫使日本加强了这些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成为美国的头号反倾销目标国，日本对外投资数额曾在一段时期呈现下降趋势。1995 ~ 1999 年出现的第四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和 2011 年以后出现的第五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的主要目标转向对世界市场的开拓方面，防范反倾销摩擦的色彩越来越淡。

### （三）主动应对日元升值，缓解反倾销摩擦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论表明，日元兑美元实际汇率贬值，日本遭受美国反

倾销数目增加，而日元升值，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数目减少。货币升值具有抑制本国对外出口、增加进口的作用，会减少本国的贸易顺差。这是因为，由于本币升值，以外币表示的本国商品价格上升，因此国外同类产品会形成对本国产品的替代，使得本国商品出口减少。同时，本币升值使得以本币表示的国外商品的价格会下降，本国会增加对国外商品的进口。如此，进出口的此消彼长会减少本国的贸易顺差，具有缓解贸易摩擦的重要作用。

虽然日本并没有为减少反倾销调查而自主调整日元升值，但 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日元兑美元汇率从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日元开始对美元逐步升值。尤其是在“广场协议”中日本积极参与西方国家干预外汇市场的活动，使得日元由“广场协议”之前的 1 美元兑 242 日元升值到 1 美元兑 120 日元，升值了一倍。应当说，如此剧烈的日元升值主要来自美国的压力，对日本经济冲击很大，但日本并没有“死扛”，而是沉着应对，巧妙利用强劲的日元升值缓解了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在客观上大大减少了美国对日反倾销调查。

#### （四）提高创新能力，力争从根本上消除反倾销摩擦

日本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遭到美国频繁发起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当时出口的商品具有较大的替代性，出口的商品并不是美国在消费和生产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且非日本不能提供的。因此，美国可以毫无顾忌地对日本产品实施反倾销手段。针对这种局面，日本积极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创新能力和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日本开始减少最终产品的生产，尽量避免以最终消费品的形式集中出口到美国市场，使产业链条逐渐上移，开发众多“世界唯一”的产品，其中跨产业创新产品成为日本出口的拳头产品。如 70 年代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光机电一体化技术产品，80 年代的融合光学、通信、电子以及材料于一体的现代光纤通信技术产品等，其替代性都很小。即便是现在，日本微电子产品中的元器件、传感器等许多零部件产品，尽管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高达 80%，却未遭受反倾销起诉。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产品几乎没有替代性，又是美国所急需的产品，因此即使是进口量再大，美国也无法也不能对其进行反倾销调查。由此可见，提高创新能力，开发“世界唯一”、不具有替代性的产品是日本解决反倾销贸易摩擦最根本的法宝。

#### （五）通过预警战略防范反倾销摩擦

预警战略是指在对外经贸活动中对可能发生贸易摩擦的潜在事件进行预报，并且评估这一潜在事件对本国外贸和国内经济的影响，以便提前做好预

案。预警战略的核心思想，是由事后的应对转变为事前的预防。

在应对美国反倾销过程中，日本建立了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发挥各自作用的“三位一体”预警机制。(1) 政府机构的作用。日本政府机构及其外围组织具有强大的信息功能。例如，经济产业省的外围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主要贸易对象国家均设立了严密的信息收集系统，这使得日本政府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主要贸易对象国甚至是其某一产业的动向。尤其是对不利于日本经贸发展的潜在事件进行实时监督和跟踪调查，并将结果迅速传递给日本的行业协会和相关企业，为日本的出口企业制定应对策略赢得先机。(2) 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是政府管理进出口事务的外延，其职能是协助政府机构管理日本的进出口事务，并且具有比政府更加灵活的特点。另外，行业协会又是为日本企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机构，是企业利益的代表，是沟通政府和企业的桥梁。行业协会在处理贸易摩擦方面具有政府机构和企业所不能企及的优点。与政府和企业相比，行业协会更加了解一个行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和对外贸易状况，因此可以更加迅速和准确地把握对外贸易中的潜在威胁，能够联合众多企业制定对外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为日本缓解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 企业的作用。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反倾销调查的承受者。因此，日本的企业总是积极搜集主要贸易国的外贸政策的变化和外贸活动的相关信息，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形成合理化的分析报告，并将分析报告呈交给行业协会。再由行业协会将分析报告进一步整理形成更加合理、更加准确的预测，进而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总之，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相互配合、共同编织的严密的预警网络，为日本预防贸易摩擦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应对策略得当，使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数目逐渐下降，到21世纪初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2008~2011年的连续四年中日本均未遭到美国的反倾销调查，足以证明日本的应对策略颇有成效。当然，这里还有其他原因，如日本经济长期衰退而对美国经济的威胁相对减弱，日本通过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转嫁对美贸易顺差也减弱了来自美国的压力等等。

#### 四 中日两国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情形惊人相似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国家，而中国自90年代以来频繁遭遇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替代日本成为美国对外反倾销调

查的头号目标国家。中日在遭受美国反倾销的成因方面十分相似，如中日两国的出口市场都比较集中，美国是中日两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日两国均与美国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等等。正因为如此，90年代以后的中国与80年代的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的情形呈现出许多相似性。

(一) 美国对中日两国实施反倾销的势头猛、占比高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的数目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989年达到最高峰，之后呈减少之势。如图3所示，美国对日本发起的反倾销在1980~1984年、1985~1989年分别是23起和37起。而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在1980~1984年仅为8起，但在1990~1994年、2000~2004年和2005~2009年这一数字爆炸式地上升到了38起、40起和42起，呈现出更明显的上升趋势。从占比来看，美国在80年代总共发起了468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日本的反倾销调查为60起，占比为12.8%，最高年份的1989年高达40%；美国在90年代总共发起了428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日本的反倾销调查为43起，占比为10%，而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为55起，占比为12.9%；在21世纪的头十年，美国总共发起了313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日本的反倾销调查为14起，占比为4.47%，明显下降，而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为82起，占比为26.2%，明显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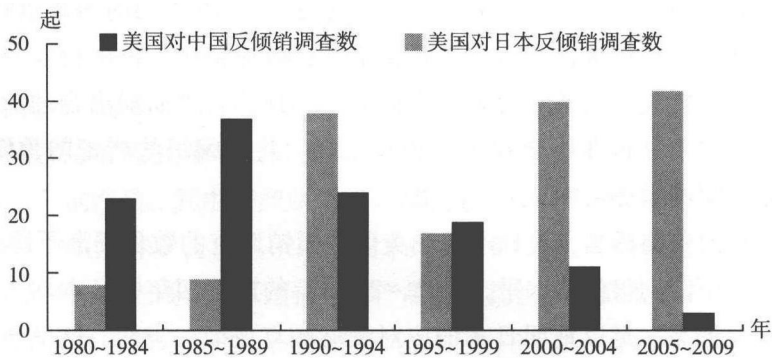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对中日两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公布数据制作。

(二) 美国对中日反倾销调查的确定性裁决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美国频繁对别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但是否做出确定性裁决意味着情形大不一样。如做出确定性裁决，则对出口国产生实质性沉重打击；若不做出确定性裁决，对出口国打击较小，警告性意义更强些。根据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进行粗略计算：1980~1989年，美国的反

倾销确定性裁决对世界的平均水平为 37.6%，而对中日分别为 56.7% 和 70.6%；1990～1999 年对世界的平均水平为 43.7%，而对中日分别为 58.1% 和 60.0%；2000～2009 年对世界的平均水平为 50.5%，对中国则高达 75.6%，而对日本减少为 35.7%。

(三) 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均集中在中日的出口优势产业，并随中日出口优势的变化而变化

在二战后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日本经济恢复期，纺织产业和杂货产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日本重点发展的产业，其中 1955 年纺织产业在日本制造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为 16.2%。<sup>①</sup> 日本棉纺织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市场中所占的比重由 1951 年的 17.4% 上升至 1955 年的 54.7%，1956 年又上升至 60% 以上。<sup>②</sup> 这使得美国竞争产业的生产商认为日本企业有价格倾销嫌疑。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日本的产业结构由纺织业等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过渡，日本重点支持钢铁、电子、机械、合成纤维、石油化工等行业，美国开始对日本的钢铁、合成纤维等产业进行反倾销调查。20 世纪 70～80 年代，日本的产业结构再次由重工业化逐渐升级为技术集约化，美国对日反倾销调查的重点又转变为汽车、机床和半导体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20 世纪 90 年代，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之下，日本的产业结构由技术密集型升级为知识密集型，美国对日反倾销调查也逐渐向这一产业转移。

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情况也是如此。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对中国总共发起了 17 起反倾销调查，主要涉及的行业是化工、轻工、纺织、金属产品、机械和医药、冶金等七大类。90 年代，美国对中国总共发起了 55 起反倾销调查，涉及的产品在 80 年代的七类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农产品、汽车和有色金属等三类产品。2000～2011 年，美国总共对中国发起了 91 起反倾销调查，进一步涉及造纸、煤炭以及建材行业。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所涉及的行业范围不断扩大，但是集中领域逐渐由纺织行业和化工行业向中国的重点产业机电和五矿行业转变。

当然，美国对中日两国实施反倾销调查也存在一些不同点。与日本相比，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更频繁、更迅速，出手更狠。美国在决定是否实施反倾销调查时，最主要的依据是自进口来源国进口的产品是否对本国产业造成

① 参见张季风主编：《日本经济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14 页。

② 参见王厚双、刘向丽：《国际贸易摩擦：理论、法理、经验与对策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年，第 106 页。

损害,但也不能排除非经济因素。因此,即使是同样数量、同样程度的进口,由于进口对象国的不同,美国也可能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出于打压中国这一政治方面的考量,美国对发起反倾销调查往往实行双重标准。由于意识形态等的差异,如果是日本企业,美国就可能网开一面,未必采取严厉的反倾销调查;倘若是中国企业,美国则会迅速出手毫不留情地采取反倾销调查,甚至还会开动舆论宣传机器,丑化和妖魔化中国企业,以达到打压中国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对外反倾销还有很强的示范效应。由于美国在全球市场上有着特殊地位,一旦美国针对某一贸易对象的某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会很快效仿,而且其力度与手段的变化,也会影响其他国家实施反倾销的深度与广度。例如,在美国对中国的光伏产业展开反倾销调查后,欧盟也随之对中国光伏产业展开了反倾销调查。

## 五 结 语

在应对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与处理日美贸易摩擦时,日本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处境,注意全面把握日美关系,底线是决不从根本上损害日美关系,坚持斗争却掌握火候,利用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等多边国际经济组织,尽量争取利益。每次摩擦的结果,表面上都是以日本的屈服和美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但往往是日本从中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这与日本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不无关系。

近些年,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数目逐渐下降,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日本对美出口额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则因为日本通过向中国出口高端零部件,再由中国组装出口到美国市场,表面上减少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而实际上等于将对美顺差转嫁到中国头上。这导致中国对美出口额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使美国对外发起反倾销的焦点逐渐由日本转移到中国。中日贸易当中,中国长期保持巨额逆差,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处于产业供应链条的下端,这种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此外,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其中与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按国别统计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达5210亿美元,对美出口3684.3



亿美元，进口 1525.7 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高达 2158.6 亿美元。<sup>①</sup> 今后，随着中国出口总额的不断上升，对美国的出口额也将随之上升，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还可能有所增加。对此，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

目前中国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成因和特点：与日本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所经历的情形惊人相似，彼时日本采取的规范进出口市场秩序、实现出口多元化、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建立健全反倾销预警机制以及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等应对策略和经验，尽管由于国情不同不能完全照搬，但也颇值得借鉴。

### **A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U. S. Anti - dumping Action against Japan and Japan 's Countermeasures**

*Zhang Jifeng and Fang Hanguo*

On the basis of a historical review of U. S. anti - dumping investigation on Japan and Japan 's countermeasures and a metric analysis of related macro - economic factors through Pearson model and negative binomial model,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conforms with the economic anticipation,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 making of anti - dumping policy. Japan 's countermeasures include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strategy, FDI strategy, making use of Japanese appreciation, improving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adopting early warning system. It is argued that China and Japan share a number of similarities when facing U. S. anti - dumping investigation, and Japan 's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of U. S. anti - dumping action has reference meaning to China.

### **アメリカの日本に対するアンチダンピング影響要因および日本の対策に関する分析**

張 季風 房 漢国

アメリカの日本に対するアンチダンピングの背景と日本の対策の歴史を振り返った上で、ポアソンとマイナス2項のモデルでそのマクロ経済影響要因を分析して得た回帰結果は経済学期待値と一致している。この分析は、アンチダンピングの対策の作成に方向性と理論支えを提供した。日本の対策としては貿易収支バランス戦略・海外直接投資戦略・円高活用・イノベーション戦略・未然防止警報戦略などがあげられる。分析によれば中国と日本はアメリカからのアンチダンピングの状況に共通点が多く、日本の経験は中国の参考になるとと思われる。

(责任编辑：叶琳)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2013年第12期。